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九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六二期 ——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9a)

- | | | |
|--------|--|-----|
| 【史实辨析】 | 伫视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
——《宋彬彬谈话纪要》的解读及其它（上） | 郎 钧 |
| 【读书笔记】 | 红卫兵运动的起源 | 尹敏志 |
| 【往事非烟】 | 永忆 1976 年 | 王 蒙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实辨析】

伫视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
——《宋彬彬谈话纪要》的解读及其它（上）

• 郎 钧 •

46年前的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卞仲耘之死开红八月滥杀无辜之端、开文化大革命滥杀无辜之端，46个年头过去了，却不可能通过法律的途径还死者和家属一个公道。

2002年，卡玛拍摄电影《Morning Sun》，红卫兵纷纷登上银幕妄说历史。宋彬彬在黑屏后面为自己辩解。

2005年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在胡杰先生拍摄的电影《我虽死去》中曾经说过，既然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

红卫兵想改写历史，受难者家属要诉诸历史。王晶垚先生和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势在必行，无可退避，但对簿的时间要因事态的发展而决定。

王晶垚先生和宋彬彬对簿的公堂不是司法的公堂，是历史的公堂。和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已成卞仲耘之死唯一的归案之途。

第一章 对簿历史公堂的过程

大陆电子刊物《记忆》自2010年4月第47期刊发表宋彬彬等人的《也谈卞仲耘之死》之后，至今已经组织了三期“师大女附中专刊”。这三期专刊对46年前在师大女附中校园中惨死于红卫兵皮鞭和棍棒之下的死者表现出了极大的漠视和冷淡——从卞仲耘校长到那个至今不知姓名的玉华台饭庄19岁的女服务员。红卫兵在《记忆》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的文字合计已经超过20万字。这20万字对卞仲耘案件所作“另一种陈述”之目的就是要改写历史。很多人，包括一些文革研究的知名人士都纷纷表态挺宋褒宋，唯恐落后，景象蔚为可观。

但是，横竖翻看这20万字，读者会很容易地发现，旨在漂白宋彬彬的20万字对卞仲耘死亡案件和女服务员死亡案件的廓清并无丝毫贡献。确切地讲，这三期专刊应该叫做“宋彬彬专刊”。红卫兵和红外围（文革中由于出身不好不能参加红卫兵，而自称是红卫兵外围的人和组织）在与卞仲耘案件有关的，旨在改写历史的叙述中只是作红口白牙之讲述，没有拿出任何历史的证据。从宋彬彬矢口否认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是自己的作品，到编造抢救卞仲耘的神话都没有拿出一个字的历史凭证。唯一一个文字证据是文革红人李松文写的关于“七人字条”的证明信，公然编造七人字条的虚假来历。这封证明信写于2010年，充其量是一个案发44年后的口供之笔录——不能成为历史案件的旁证。

2012年春节期间，80期电子刊物《记忆》刊登宋彬彬的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见本刊zk1202b——编者）。宋彬彬在文章中虽不指名却已道姓，向王晶垚先生发出了指向性极其明确的信息。面对宋彬彬的寻衅，王晶垚先生无路可退。2012年3月29日，王晶垚先生在第82期《记忆》上首次公布了《宋彬彬谈话纪要》等六份历史文件，与宋彬彬对簿历史公堂。

◇ 宋彬彬文章的关键字

读过宋彬彬的文章之后，笔者曾向很多人提出过一个问题，现在笔者也向所有的读者提出同样的问题：宋彬彬的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中的关键文字在哪里？

宋彬彬的文章大约7000字。但是核心内容是下面这133个字：

“近年来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我在事发后对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说，我从远处看到了卞校长躺在宿舍楼前。我不记得与王先生交谈过有关卞校长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学、老师询问，她们对此也没有印象。所以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

这133个字是宋彬彬最想说的话，用时髦的语句形容叫做“Keywords”。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读懂这段文字内涵的人，除去宋彬彬刘进叶维丽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分子和《记忆》的大小编辑们，可能只有王晶垚先生及其身边的几个朋友了。

王晶垚先生手中存留有一份直接涉及卞仲耘被害情况的《宋彬彬谈话纪要》。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老师在校园内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卞仲耘遇难后，宋彬彬曾向王晶垚先生讲述了一些与卞仲耘之死有关的情节。之后，王晶垚先生及其子女进行了追记。在这份绝无仅有的历史文件中，宋彬彬操持着那个时代精英红卫兵所特有的话语系统，以极为冷酷的口气，讲述了她本人在卞仲耘遇害前后的所作所为。红八月的恐怖氛围没有震慑住王晶垚先生为妻子申冤的决心。字字为据，句句为证，王晶垚将宋彬彬的话统统记录在案。红八月中，有1772多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但是，没有一个死难者的家属敢于记录红卫兵的暴行。只有王晶垚先生保留了卞仲耘的血衣；用照相机拍摄了妻子遍体鳞伤的遗体；用笔记录下了与诸多女附中师生的谈话内容。这些谈话记录以真实的语境和不同的视角再现了卞仲耘被害前后的很多细节。其中以《宋彬彬谈话纪要》《胡志涛谈话补记》《王永海谈话记录》《宋淮云、刘秀莹谈话记录》最为珍贵。

这些可供后人分析研究文革期间发生在北京的第一桩群体杀人案的文字记录的存留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些故纸陈墨是王晶垚先生用毕生之心血保存下来的。在适当的时候把它交还给历史，是王晶垚先生的愿望。正因为如此，这些文字的存在成为红卫兵妄图为卞仲耘之死做“另一种陈述”的最大障碍。

最早接触到这批材料的是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学生王友琴女士。时间是在1993年9月中旬。她对这些资料还进行了抄录和复印。她那篇著名的文章《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关于卞仲耘挨打和倒下的描述就源于王晶垚先生的这些材料。

大陆的文恒文化公司在2006年—2007年间也接触过这批材料。

2002年，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开始策划对卞仲耘之死做“另一种陈述”前的准备工作。

2002年—2006年这段期间，叶维丽、刘进，还有曾经做过中国红卫兵的美国女人卡玛走马灯似地不断出现在王晶垚先生家中。她们又是送书、又是送花，还说些不关疼痒的道歉话，一时间还真挺热闹。王晶垚先生为人宽厚，开门揖盗。红卫兵红外围乘虚而入，她们在《最后的晚餐》的油画下面谈笑风生（王晶垚语）。

这些当年的红卫兵来访时，从来不向王晶垚先生询问与当年卞仲耘之死有关的任何细节问题。尽管这个时期是她们自称所谓“重新调查”卞仲耘案件的启动阶段。

宋彬彬说，46年过去，之所以一直想没有去王晶垚家，是不想因自己的敏感身份，给老人带去刺激和哀伤。其实不然！将王晶垚先生及其记录保留的历史资料排除在卞仲耘案件的被调查对象之外是红卫兵们的既定方针。不仅如此，一个可以叫做阴谋也可以叫做阳谋的计划开始实施。这个计划的实施，并不需要宋彬彬本人亲自出马。

就在叶维丽、刘进携手谋划的2002年夏秋之际，后来参与《也谈卞仲耘之死》五人之一的于羚经叶维丽介绍，开始进入王晶垚先生家中。理由很充分——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文革材料。在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于羚不但多次聆听王晶垚先生讲述当年惨案发生前后的相关情节，而且接触并抄录了几乎王晶垚先生家中全部与卞仲耘有关的文字资料，字数不会少于三四万字。

不仅如此！叶维丽还通过于羚向王晶垚先生借阅这些与卞仲耘案件有关的重要材料，其中包括那份《宋彬彬谈话纪要》。于羚在王晶垚先生的笔记本上替叶维丽写下了借条。下面就是于羚帮叶维丽借阅王晶垚先生手中资料的影印件。（图1略——编者）

这个借条清楚地表明，不但于羚看过和抄写过《宋彬彬谈话纪要》，叶维丽也看过《宋彬彬谈话纪要》等材料。叶维丽自称是“营垒中人”，互通情报是理所当然的。以其和宋彬彬、刘进共营垒之关系推断，这份《宋彬彬谈话纪要》以及王晶垚先生手中的其它与卞仲耘死亡有关材料宋彬彬本人也应该是读过的，其复制件或许至今还置放在宋彬彬办公室的桌案上。叶维丽谋定而动，策划有方；于羚深入浅出、忙而不乱。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叶维丽和于羚真的没有把材料送给宋彬彬看过。做这种隐匿“情报”的事情的目的何在？就是要看宋彬彬的笑话？

如何对付王晶垚先生保留了40多年的材料呢？在后来的10年中，红卫兵的对策逐渐浮出水面。

王晶垚先生并不是对红卫兵的诡异行为没有丝毫察觉。2002年深秋的一天，一些朋友们应邀在王晶垚先生家里观看卡玛的电影《Morning Sun》（英文版）。当时在场一起观看电影的还有于羚女士。叶维丽的嘴脸出现在影片中，当讲到卞仲耘之死时，叶维丽说卞仲耘死亡的最初原因是心脏病。

耳熟能详啊！三十三年前红卫兵就是这样说的，宋彬彬当年就是这样说的，刘进当年就是这样说的。王晶垚先生让朋友反复播放叶维丽的这段讲话。之后王晶垚先生陷入长久的沉思。

从那时起，受难者家属王晶垚先生和红卫兵围绕着卞仲耘案件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开展了一场不为常人所察觉的抗争。这场抗争经历了三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

2007年秋季，师大女附中举行90周年校庆。宋彬彬被校方选定为“知名校友”，宋彬彬给毛戴红袖章的照片赫然树立在校园中。红卫兵们在人民大会堂杯盏相碰、弹冠相庆。

红卫兵首鼠两端。原来造访和道歉都是在搞障眼法。王晶垚先生如梦初醒。老人毅然发表《公开信》阐明自己的立场。老人在定稿的最后时刻亲自在打印稿件上注明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的那个红袖章上“有卞仲耘的血”。

自王晶垚先生发表声明之后，刘进、叶维丽，还有那个于羚再也没有登过王晶垚先生的家门。就像黎明前在街道上蹦跳的女巫，当人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她们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第二个回合

2010年4月底，《记忆》第47期是师大女附中专刊。重头文章是宋彬彬、刘进、叶维丽、冯敬兰和于羚的《也谈卞仲耘之死》。为了扩大《也谈卞仲耘之死》的影响，她们将《也谈卞仲耘之死》改名《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发表在《炎黄春秋》2010年的第7期上。在洋洋近五万字的文章中，于羚和叶维丽只字不谈王晶垚先生记录和保留的资料中所呈现的事实。将这些资料中与宋彬彬和红卫兵有关的情况完全被屏蔽在《也谈卞仲耘之死》之外，好像他们从未见过王晶垚先生手中的材料似的。例如，于羚明明知道“七人字条”是当年王晶垚先生向宋彬彬等七人索要，却在《也谈卞仲耘之死》中公然伙同冯敬兰和李松文制造“医院向校方索要签名字条”的谎言。她连在《也谈卞仲耘之死》的文章中客观呈现王晶垚先生关于“七人字条”来历的勇气都没有。

胡适和傅斯年都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近代史学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主张研究历史

必须基于客观地搜集研读档案资料之后，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他的这种史学主张，被称为“兰克史学”。叶维丽是美国史学博士，对史学研究的大原则应该一清二楚。但是在“卞仲耘案件”的实际操作中，却采用屏蔽历史资料的做法。此等卑劣的史料筛选模式也是从美国导师那里学来的吗？

王晶垚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建国后又在近代史所工作30年。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决定了他的做法和红卫兵的做法截然不同。王晶垚先生采取的做法就是出示文革时期的文字记录。

无论是王晶垚先生还是宋彬彬，或者其他入，仅凭46年后的言说都是很危险的。现在，红卫兵在《记忆》上就是靠红嘴白牙漫无边际地胡说。王晶垚先生，一个今年91岁的老人，如果他只做言说，其谈话内容也肯定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林莽老先生在90岁时发表了指控宋彬彬的文章。虽然所述事件的时空间有所错乱，但基本事实应该是成立的。可是被红卫兵抓住不放、大做文章。唐德刚在采访90高寿的胡适和张学良后就发现，这些老人在回忆往事时，诸多事件的细节描述之时空间是不对位的，是错乱的。但是事件本身的客观存在是不容怀疑的。

王晶垚先生面对红卫兵的诡辩时，选择出示历史资料，这是史学工作者的职业性选择。为了回应红卫兵的另一种陈述，王晶垚先生选择在《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10期上公布了张静芬老师在卞仲耘遇难后4天发出的匿名唁函。

张静芬老师的这封匿名信几乎涉及了卞仲耘被害前后的全部重要情节：被打的情况、被滞留校园不予抢救的情况、第二天刘进广播讲话内容等等。对照张静芬老师在卞仲耘被害后第一时间的陈述，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红卫兵的“另一种陈述”完全是胡扯！

读者多是感慨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还有人敢于揭露暴行。而真正能读懂王晶垚先生公布历史材料的更深层用意的人却很少很少。但是红卫兵读懂了。

如何应对王晶垚先生出示历史资料的举动？如果王晶垚先生将他手中全部与卞仲耘之死有关的材料包括那份《宋彬彬谈话纪要》公诸于世该如何应对？以往对王晶垚及其资料所采取的屏蔽和不提及的策略显然已无效，红卫老兵们需要拿出新的对策。

第三个回合

老红卫兵们在经过差不多两年的反复研讨之后，终于决定以攻为守。她们在2012年1月31日的第80期《记忆》上发表了宋彬彬的《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文中写下了上文引录的133个字。而这133个字中又以“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这32个字为关键字中的关键字。

宋彬彬的这32个字背后隐匿着以下若干个暗示：

第一、宋彬彬欲盖弥彰，故意不提王晶垚先生手中的《宋彬彬谈话纪要》，似乎她今生今世从未见过这份谈话记录。

第二、宋彬彬否认文革中见过王晶垚先生。是想从根本上挖去了王晶垚先生手中这份《宋彬彬谈话纪要》历史根基。使这个文本沦为一个“民间流传”的版本，最终落得个“不足以为信”的下场。

第三、宋彬彬实际上是在暗示王晶垚先生不要出示这份《宋彬彬谈话纪要》。即使你王晶垚在媒体上出示了这份文件，我宋彬彬也不会认账。胎死腹中——是宋彬彬留给王晶垚先生处理

手中与卞仲耘之死有关的文字材料的唯一选择。

与宋彬彬的文章同步，红卫兵战友刘进在第80期《记忆》上放出“孤证”说。所谓“孤证”说，就是将揭露红卫兵丑恶行径的文章统统划入“孤证”范围，以“孤证不立”为据一律予以抵赖。面对陶洛诵同学的指正和林莽先生的指正，刘进都以“孤证”为由予以抵赖。

闹剧即使穿帮，也要一直演下去。她们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不仅如此，“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红卫兵对王晶垚先生向世人出示历史资料的局面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面对宋彬彬最后通牒式的异常举动，王晶垚先生没有选择的余地。积46年之心血记录和保留下来的材料不可能因为宋彬彬的一句话就成为一叠废纸。46年前，红卫兵呼啸北京城时，王晶垚先生都没有退缩，46年后，莫非红卫兵还敢杀人？

立即公布这些材料，让这些材料即刻见天日是王晶垚先生唯一的选择。这些材料是：

- 1)《宋彬彬的谈话记录》;
- 2)《胡志涛谈话补记》;
- 3)《刘文连谈话记录》(原件遗失，尚未发表)
- 4)《宋淮云刘秀莹谈8月6日上午校文革刘进广播稿》
- 5)《汪彬彬 全校控诉会控诉记录》
- 6)《王永海谈话记录》
- 7)《6·6·8·5晚在邮电医院出面人员(名单)》

还有就是叶维丽2003年8月23日通过于羚(笔迹)借阅有关材料的借条影印件《于羚代叶维丽写的借条》。为了袒护叶维丽，《记忆》的编辑拒绝在第82期上将其与其它6份资料一起刊出。

需要说明的是，王晶垚手里的材料证明，宋彬彬在卞仲耘被害后不止一次见过王晶垚先生。王晶垚先生记录的和宋彬彬的谈话记录也不止现在公布的这一篇。王晶垚先生用毕生的心血保留下来的这些文革资料是最重要的文革档案，将成为“卞仲耘案件”的最权威的研究资料。

政见可以不同，立场也可以选择。于羚和叶维丽可以选择为红卫兵辩护，为宋彬彬辩护，也可以为“红八月”辩护。但是，诚实面对史料是正直的人所具备的品德。如果她们还保留着那么一点点人的良知的話，希望她们两人能够在媒体上(最好是在《记忆》上)宣布确实抄录过和阅读过王晶垚先生公布的那些材料;至于这些材料是否给宋彬彬看过也应该给读者一个交代。

下面，就让我们来翻动一下这些发黄的纸页，看看这些已褪色墨迹都记录下了些什么？

第二章 《宋彬彬的谈话记录》等材料的解读

多年来，涉及宋彬彬及其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与8·5事件的关系的文章很多。最近两年来，讨论的问题逐渐聚焦，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 第一、8·5事件发生时学校有没有领导机构存在？
- 第二、8·5事件发生时，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否已经成立？
- 第三、宋彬彬抢救过卞仲耘吗？

第四、刘进在 8 月 6 日的广播里都说了些什么？

第五、宋彬彬在文革中打过人吗？

认真阅读王晶珪先生出示的材料，上述问题基本可以廓清。

下面是《宋彬彬谈话纪要》要点摘录：

八月五日，……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 XX、XXX，一直到送医院。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

先说拉到卫生所，然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的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已快黑了，记不清了。

……

事情发生后，当时我们革委会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我们后来到高一去调查。

这个广播有个稿

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

我们当时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不清楚，而且卞的线多，人死了对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

……

◇ 8·5 事件发生时学校有没有领导机构存在？

现在讨论第一个问题：8·5 事件发生时学校有没有领导机构存在？

这个问题的附带追问是：宋彬彬是不是学校领导机构的成员？8·5 事件是校方组织的还是学生自发的？

多年以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撰写的与卞仲耘之死有关的文章都说，1966 年 8 月 5 日下午对卞仲耘的批斗是学生（高一 3 班）学生自发组织的，校方领导机构不是这次批斗会的组织者。甚至否认校方领导机构和红卫兵在 1966 年 8 月 5 日已经存在。叶维丽曾气势汹汹地发出质问“8 月 5 号时，是否存在一个名分明确、有职有权的‘权力当局’？”当然，她的回答是否定的。

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初二四班学生张鸿敏（现笔名敏一鸿）2010 年曾撰文《追究卞仲耘惨案真凶》（见本刊 z k 1 0 0 8 d——编者）。文中明确表示：全校有统一组织指挥、不是权力真空。张鸿敏用亲身经历证明，工作组离校后，学校不是无政府状态。

1967 年 5 月 27 日，老师刘文莲和王晶珪有过一次谈话。事后，王晶珪对这次谈话记录进行了追记。这份《刘文莲谈话记录》（尚未正式发表）中记载：

“8 月 4 日学生参观了四中的武斗，第二天就学习了。武斗开始以后，高三有些学生曾表示，还未定性，不应这样打，打死了怎么办？但没有组织正式出面制止”。

关于 1966 年 8 月 4 日发生在北京四中的暴力事件，四中学生和老师是这样记载的：

“8 月 4 号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事情，我们当时都在劳改队关着呢，这个学生一点名，四中一批红人，当时恐怕得涉及到二三十人，全校的学生聚集在操场，围着跑道两边，杨滨、

然后我，然后于主任，杨刘于屈，后边一群所谓的支部的红人，围着操场，一边走着，学生就一边打，那时候我才33岁，我那会还年轻，杨滨呢，当时已经快60了，走着走着就跌倒在水坑里头。整个打了一圈……”——北京四中”口述历史”研究小组《1966—1968：北京四中的暴力迫害》第52期《记忆》

“8月4日，四中爆发了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流血事件。四中的校领导与教师们被勒令排成一队，有的带着高帽、有的挂着罪状、有的剃成阴阳头、有的被捆着双手，围绕着操场像游行示众一般走了一圈又一圈，接受着小将们的怒斥甚至拳打脚踢”。——水流云在《北京四中在一九六六》第52期《记忆》

组织参观四中武斗是一个女附中校方权力机关才能安排的活动。可见8·5事件绝对不是像宋彬彬刘进所言，只是一个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偶发事件。

《刘文莲谈话记录》中还记载：“人（指卞仲耘）送到医院以后，医院门口就由革委会的学生把门了”。

这里，“革委会”三个字再次出现，说明学校不是处在权力真空状态。至于为什么要派人把守医院的大门，只有请宋彬彬、刘进等人解释了。

下面看看宋彬彬是怎样说的。

宋彬彬在《宋彬彬谈话纪要》中两次承认1966年8月5日存在着一个简称为“革委会”的机构：“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的证明才给看”、“事情发生后，当时我们革委会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

宋彬彬不但承认学校存在着一个名叫“革委会”（应该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机构，而且还承认她本人是其中的成员，即“我们革委会几个人……”。

200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学校史》。此书第142页中说：7月下旬“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学校史》一书的编辑一定采访了很多亲临过文革的师生后，才写下上述文字。历史的记录和现实的回忆都是吻合的。

不仅如此，在“七人字条”的问题上，也可以旁证1966年8月5日前后，女附中存在权力机构。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害身亡。当晚在邮电医院，王晶垚先生见到了卞仲耘的遗体。在停尸房的外间，有七个人一字排开站在王晶垚先生的面前。王晶垚先生说，我不认识你们，请你们写下你们的名字。之后，宋彬彬等七人留下了这个字条，表明他们是学校的负责人。王晶垚先生回家后又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七人的名字。王晶垚先生在字条上方注明：“66·8·5。晚在邮电医院出面人员”。这个“出面人员名单”和“七人字条”互为印证，是女附中当时存在领导机构的证据。

不容狡辩！1966年8月5日前后女附中存在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主要成员就是学校红卫兵的领导成员，宋彬彬就是其中的一员。当然，刘进也是其中一员。

从《宋彬彬谈话纪要》中可以清晰地看出，8月5日下午的批斗会是由学校得权力机构事先安排的。因为宋彬彬说：“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这句话的语文含义是任何一位小学生都可以读懂的。

有人会说（比如刘进），仅凭《宋彬彬谈话纪要》中宋彬彬说的“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一例文字不能完全证明对卞仲耘的批斗是有组织的。这只是一个“孤证”。

用“孤证说”来否定证明人的举证是红卫兵的一个战术。刘进已经说过：“孤证不立”。

但是，关于要对卞仲耘及其其它校领导“打打威风”的表述，仅在王晶垚先生记录和保留的文字材料中就出现过三次，另外两次是：

《宋淮云谈话记录 1967年8月15日》中记录了刘进在8月6日的广播稿，其中，刘进说到：“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

《胡志涛谈话记录 1966年12月10日》中，胡志涛说：“学生这次打人，说要煞煞他们的威风”；

除了王晶垚先生的上述三份历史记录谈到了“打打（煞煞）威风”，在女附中老三届的学生的回忆文字中，也有与“煞煞威风”有关的记载。

陶洛诵是师大女附中高一年级的学生，现旅居澳大利亚。陶洛诵在她的自传体小说《生之舞》一书中写道：“宋彬彬是红卫兵的头头之一。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我们学校是‘红八月’打人风的始作俑者”。

伏生的文字。“伏生”是笔名。她是师大女附中初二年级的学生。2003年，伏生在网络上发表回忆文章《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见本刊zk0211c——编者），其中写道：

“接着，一个学生开始大声讲话。她说，这些黑帮分子在工作组的保护下躲在屋内，明为作检查，实际在享清福。今天我们就要打打他们的威风。说着，几个学生拿来了剪刀，开始剪校长们的头发”。

宋彬彬、宋淮云、胡志涛、陶洛诵、伏生这五个互不相干的人在1966年、1967年、2003年、2007年等不同的时间段述说同一个细节，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刘进的“孤证不立”可以休矣。

红卫兵为什么要“煞煞（卞仲耘的）威风”？文革伊始，卞仲耘即被罢官，“威风”从何而来？

这还要从6·21事件说起。

6月3日张世栋为首的工作组进入学校后，卞仲耘就被停职。6月中旬，国务院转来袁淑娥（大连工学院俄文教员）所写万言揭发卞仲耘的诬告信。工作组和“革命师生代表会”对诬告信如获至宝，在6月21日召开批斗卞仲耘大会。宋彬彬在《宋彬彬谈话纪要》中讲述了6月21日批斗会前的情况：“后来到六月二十一日会不久前。张世栋喜出望外地对我们说现在有

可以罢官的材料了。我们问他是什么，他说是从国务院转来的揭发卞仲耘材料。当时张世栋根本不了解袁是什么人，听张的口气，好像袁还是党员似的”。

在6月21日的批斗会上，在工作组和“革命师生代表会”的纵容下，袁淑娥登台演讲，揭发卞仲耘。卞仲耘在批斗现场惨遭左翼学生的毒打，几次晕厥在批斗台上，张世栋、宋彬彬、刘进、李宋文等人袖手旁观。

在红卫兵的“另一种陈述”中，6·21暴力事件和8·5惨案是分立的、没有丝毫关系的两件事情。但是，6·21事件是师大女附中第一起暴力事件，8·5惨案是6·21暴力事件的延续和终点。宋彬彬刘进的“煞煞威风”之说就是链接6·21暴力事件和8·5惨案的一个重要环节。

据王晶垚先生回忆：

1966年6月21日，工作组组织斗争会批斗卞仲耘。会上卞仲耘遭到残酷殴打。事件发生后，卞仲耘与王晶垚先生连夜起草控告信，向党中央和邓小平控告师大女附中工作组。

之后，这封控告信被转回师大女附中。落入工作组和“革命师生代表会”手中。

1966年8月4日，卞仲耘被害的前一天的中午，卞仲耘给王晶垚打电话，说学校（指学校文革当局）勒令她交出控告工作组信件的底稿。王晶垚赶回家找出留存的底稿，交给卞仲耘。所以，王晶垚先生认为，“煞煞威风”不是一句泛泛之言。它的含义是：卞仲耘在6月21日挨斗之后竟敢上书控告，此威风必须煞止。

1966年8月5日早上，卞仲耘向家人做了最后的诀别，她预感到死亡快要降临。但是，46年后，红卫兵执意要把8·5事件描写成一个突发事件。

卞仲耘遇难的当天晚上，王晶垚在邮电医院看见卞仲耘的尸体后痛哭失声，回家后他悲愤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我杀仲耘”四个大字。王晶垚当时的直觉认为，是那封控告信引来了杀身之祸。

凡是对文革暴力说不的人都必须被打死。李文波对暴力说不，他就被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对文革暴力说不，她也被打死了。这就是红卫兵的逻辑，也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逻辑。

卞仲耘上书控告工作组是一件相对隐秘的事情，除了卞仲耘王晶垚夫妇和工作组，女附中普通师生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但是学校领导机构的人员肯定是知道的，工作组执政时期的“师生委员会”的成员和工作组撤退以后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宋彬彬和刘进对卞仲耘上书一事一清二楚。“煞煞威风”分别从此二人口中说出不足为奇！奇怪的是，46年后她们将此情节“遗忘”的一干二净。人们都说记忆是有选择性的，现在看来，“遗忘”也是有选择性的。

对本节做个小结：

1966年8月5日下午，为了报复卞仲耘上告的行为，师大女附中校方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召开批斗会斗争卞仲耘。目的是要煞煞卞仲耘的威风。批斗会最终失控，演变成体罚、殴打和残杀。局面失控后，宋彬彬、刘进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酿成血案，难辞其咎！说她们有责任，不仅仅因为她们是“文革筹备小组”成员，也不仅仅因

为她们是红卫兵，更因为她们是共产党党员。

◇ 8·5事件发生时，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没有？

现在讨论第二个问题：8·5事件发生时，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没有？

早在2010年第47期《记忆》发刊之前，叶维丽就撰文否认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1966年8月5日已经成立。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在2010年专门撰文进行过讨论，文章标题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里不再重复其中的内容

在王晶垚先生公布的6份材料中，《胡志涛谈话补记》中对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存在于1966年8月5日有清晰的记录：

“我说：‘XX，叫我搬就搬，不要打。’XX说：‘不许叫我’，还是打。后来红卫兵集合去开会（红卫兵成立会）。X即把胡交给一批初一初二的学生监督”。

胡志涛的回忆发生在1966年12月9日。亲身经历的事情，记忆不会有误。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早在7月29日以前就纠集成伙。但是成立大会是在8月5日召开的。用批斗校领导和暴力升级做为红卫兵成立大会的一项仪式，在当时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前文索引，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史》。此书第142页中说：7月下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红卫兵掌权。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原师大女附中老师刘秀莹2006年在《卞仲耘，一位令人深切怀念的好校长——纪念卞仲耘同志殉难40周年》一文中写道：“那是1966年8月5日，十年浩劫开始，她——一位老革命同志，在自己曾经勤恳工作了17年的校园里，拖着病重的身体，受着烈日的酷晒，干着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同时遭受红卫兵和学生们的批斗，她是被红卫兵和学生们用狼牙棒和乱拳打死的。卞仲耘同志满怀悲愤地殉难了，这是师大女附中校史上耻辱的一页，也是我们心中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

证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1966年8月5日已经成立的文字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引用。

事情很清楚，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不是像叶维丽所说，是在8月18日前夕才成立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卞仲耘惨案的肇事者。46年之后，她们却想让全体师大女附中学生共同承担打死卞仲耘的血债。有此想法，有此做法，良心实在是坏了。

◇ 宋彬彬抢救过卞仲耘吗？

现在讨论第三个问题：宋彬彬抢救过卞仲耘吗？

“宋彬彬抢救过卞仲耘”是红卫兵在第47期《记忆》上爆料出的最荒诞不羁的神话。笔者曾经撰文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2010年4月30日之前的全部师大女附中师生的回忆文字中，甚至包括白芳（叶维丽）的文章均无宋彬彬抢救卞仲耘的记载。

白芳（叶维丽）2007年为母校90年校庆撰写《卞仲耘之死》（见本刊zk1005d——编者）在谈到卞仲耘死亡的情况是这样写的：

“教职员中没有人敢站出来为校领导说话。一位老师后来说，在那种气氛下如果有人敢这么做，也会遭到与校领导同样的命运。文革开始后老师们差不多都遭到来自学生的程度不等的批判。暴力行为一起，多数老师都胆颤心惊，一心想伺机逃离。有几个留下来的人后来帮助把卞送到了医院。

这里需要考察一下前面提到的‘核心学生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在做些什么。据XX（笔者注：XX应该是指刘进）讲，在游斗校领导时，她们正在一间屋子里开会，而讨论的议题是：工作组撤走后，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有学生进来报告说，人打得太过火了，于是有几个人出去‘劝阻’过激的行为。而再次有人闯进来报告时，带来的消息则是‘卞仲耘快要不行了’。”

叶维丽的这段文字讲了两个情况：

第一、是几个留下的老师把卞仲耘送到了医院；

第二、叶维丽本文的叙述逻辑很正常，她发问，当老师把卞仲耘送到医院的时候，“核心学生群体”——即红卫兵领袖在干什么？刘进回答叶维丽的追问，说，听到过“卞仲耘快不行了”的报告。叶维丽的文章叙述到这里这里嘎然而止，没有一字一句关于抢救情节的描述，随后，文章进入下一段落开始讨论“主要动手的是革干和革军子女”的问题。

事情很清楚，“抢救卞仲耘”的神话在2007年的夏季还没有被刘进叶维丽一伙研讨和编造出来。

《刘文莲谈话记录》清楚地记载了抢救卞仲耘的过程：

“……后来才听说，送到门口，学生不让出校门，说她装死，不让送。人一直放在小操场，我们跑过去看时，她身上盖着一张白纸。这时，学生们害怕了，说，我们不管了。这时，我、陈云南、王桂莲等人就给卞洗脸，眼里都是泥，眼球已经不能动了。嘴里在吐气，吸气少。王桂莲拿来她的衬衫、裙子，准备替她换，已经没法换了。学生怕这样子送医院影响不好，所以才不让送。叫刘医生来看。刘医生来已经摸不出脉了。说我看不了，学生还骂他。……”

刘文莲讲述的内容包含两个内容：

- 1）卞仲耘眼里都是泥，眼球已经不能动了。嘴里在吐气，吸气少；
- 2）刘文莲、陈云南、王桂莲等人就给卞仲耘洗脸。

刘文莲1967年5月讲述的有关抢救的过程中，没有宋彬彬出现，也没有刘进出现。

2010年4月，叶维丽和刘进在《也谈卞仲耘之死》中首次在《记忆》上编造“抢救卞仲耘”的神话。刘进说：

“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

……不过，这些具体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当时我们完全懵了。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

叶维丽是这样说的：

凡是刘进说的，叶维丽都相信：“我倾向相信刘进说的，你们在听到人（卞）躺在垃圾车里奄奄一息的消息时，马上就行动了”。

凭空制造这个神话的目的就是为宋彬彬登台亮相做铺垫。一个抢救过卞仲耘的大善人大恩人何必道歉呢，卞仲耘的家属应该感恩戴德、鞠躬致谢才对啊。

可是读者在《宋彬彬谈话纪要》中没有看出任何与抢救有关的蛛丝马迹：

“八月五日，……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 XX、XXX，一直到送医院。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

先说拉到卫生所，然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的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已快黑了，记不清了。……

事情发生后，当时我们革委会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

为了能够让读者看懂上述文字。笔者有必要介绍一下 46 年前卞仲耘的三个受害现场。

从《胡志涛的谈话补记》和《王永海谈话记录》中，以及以前师大女附中师生和红卫兵的回忆文字中可以看到，卞仲耘在那个黑色星期五的下午曾经在校园的三个地方逗留过：大操场—宿舍楼—校北门内侧。

第一现场：大操场上。卞仲耘和其他学校领导成员被批斗还强迫体罚挑土，时间是三点左右（有人说是下午两点左右）。王永海这样回忆：

“……下午三点左右，开始时，先看到有百十个学生把她们五个人叫到一处，后来操场上有四五百学生，让卞校长她们五个人游街，头上戴着纸篓。学生叫我们准备好铁锹，筐子等工具，准备让他们挑土。两只筐子装满了土，有一百多斤，谁也挑不动”。

第二现场：女生宿舍。是卞仲耘倒下去的地方，之后再也没有站起来，这是她的死亡之地。时间是四点左右。王永海这样回忆：

“卞校长不知怎么被带到宿舍楼去劳动的？过了不久（个把小时？），有三四个学生站在学生宿舍门口喊我们，喊我们：”你们把大便（卞）拉走！”我们都怕挨打，哪敢不应。

我们进去一看，卞校躺在大门里边过道的地上。头朝北脚朝南。她身上全是水，满地也都是水。有一股腥味。她的脸已经不象样子了，嘴里不停地在“噗！”“噗！”地往外喷着绿色的沫子。身上的衣服已经不像衣服了，白衬衫变成灰黑色的了。她的鞋子已经不在脚上，是放在脚旁边的地上。我们三个人把她抬起来，很沉，很沉。我们把她放在运土的车子上（前面有两根杠子的人拉的车子），头朝后，脚朝前。我把她的鞋子也放到车子上，鞋子上有大便。”

《也谈卞仲耘之死》的五人之一的冯敬兰曾经对这个现场有清晰的描述。

《王永海谈话记录》还透露一个重要内容，即红卫兵曾经命令王永海用平板车将遍体鳞伤，濒于死亡的卞仲耘拉回卞仲耘的家。王永海是这样说的：“后来有的学生叫我们把卞校长送回家，我们说，不认识地方。他们说，你们不会问？有的学生反对往家里送，大概感觉那样推着车子在街上走着不好。这样，人就躺在院子里没人管”。从王永海的谈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红卫兵把人打死后并没有作鸟兽散，她们从容地提出各种处置办法，其中就是没有立即送医院的决定。

第三现场：校北门内侧，一辆手推车承载着已经死亡的卞仲耘，从下午三、四点钟一直逗留到晚上七、八点钟。对这个现场描述的最为细致的人是胡志涛，她是这样回忆的：

“卞躺在拉土车上，身上压着大板子、扫帚、簸箕、纸，乱七八糟的东西，拉开一看，卞两眼瞪天，口里喷沫，两腿裤子上都是粪便，（那个样子惨不忍睹），（以后十几天，白天晚上，一闭眼就看见她那个样子。）

当时我一看，人完了。我就对学生说，快送医院吧。但是没人送。后来胡坐在屋子里，从窗子往外看。”

胡志涛在1986年写的《八·五祭》中的再次描述卞仲耘遇害的第三现场。其内容和1966年12月对王晶垚先生的讲述基本一致。

卞仲耘是如何从第三现场被送往医院的？

《王永海谈话记录》中是这样记载的：“大约过了一两小时，才看见邮电医院大个儿的徐大夫来了。有的老师还给卞校长洗了脸，因为脸上不像样子了。后来，是两个老师用担架把卞校长抬走的。临走时，听有人说：拿一件雨衣来，用雨衣把人盖起来，从东楼东北面新开的大门抬到对门的邮电医院去的”。

胡志涛在1986年写的《八·五祭》中也回忆了卞仲耘被送往医院的情况：“夜幕渐渐地落下来了，我看看肿胀的手腕上那只被污水模糊了的手表，时针正指在七点上。窗外有人走动。不一会儿，校医带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担架从北门抬出去了。”

胡志涛和王永海的回忆中，红卫兵根本没有出现在第三现场。所谓抢救卞仲耘之事更是无稽之谈。

《宋彬彬谈话纪要》没有涉及第一现场，而是从第二个现场宿舍楼的情况开始叙述的。

当“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的时候，宋彬彬说：“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这说明她旁观了武斗，尽管卞仲耘已经倒下，但是宋彬彬“没有过去”。这“没有过去”四个字，可以包含很多信息，例如宋彬彬确实没有参与殴打卞仲耘。但是无法包含“劝阻”和“抢救”的信息。

当卞仲耘在宿舍楼倒下的时候。宋彬彬还说：“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已快黑了，记不清了”。宋彬彬关于卞仲耘滞留第二现场的时间也是错误的。她说“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已快黑了”是不对的。天黑以前，卞仲耘就已被王永海等人从宿舍楼走走了。这一切说明宋彬彬离开第二现场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在第三现场出现过。而第三现场是卞仲耘被送往邮电医院的出发地。

从宋彬彬的上述回忆中，读者可以发现宋彬彬在谈话中始终没有提及第三现场，也就是卞仲耘在女附中的最后滞留地——校北门内侧。如果宋彬彬抢救过卞仲耘，以卞仲耘死相之惨烈，

她想不涉及都不可能。

当卞仲耘遍体鳞伤，濒临死亡的时候，没有人去抢救，停放她的小车被置放在烈日下，她的身上堆满了大字报纸、板子。这个时候宋彬彬到底在干什么？

◇ 宋彬彬面对王晶垚先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作为

宋彬彬承认，当得知卞仲耘被打倒在宿舍门口的时候，她没有过去。她不过去的原因是她认为：“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这短短的几行字清晰地表明宋彬彬没有采取任何抢救措施。

她接着说：“事情发生后，当时我们革委会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这是一个何等冷酷的人啊！她竟然当着死者家属面说，面对死人并不紧张，还为之鼓了掌。宋彬彬到底都讲了些什么话，还迎来一片掌声，46年后是否可以如实告诉读者？

综上所述，一个和一群为死亡鼓掌的人会去对濒临死亡的人实施抢救吗？宋彬彬抢救卞仲耘的神话可以休矣！

◇ 刘进在8月6日的广播里都说了些什么？

讨论本节内容之前，首先要强调指出一点，就是刘进最近关于8·5事件的讲述没有一句话是可信的。例如，她声明自己1966年8月19日已经退出女附中文革运动，成了一个逍遥派。但是王晶垚先生记录下来的资料中显示，刘进在所谓退出学校文革后，还多次去王晶垚家问东问西。这些记录清晰地证明刘进在撒谎。

现在讨论正题：刘进在8月6日的广播里都说了些什么？

1966年8月6日上午，也就是卞仲耘被打死后的第二天，刘进在学校的广播里以校方负责人的身份向全校师生公布了卞仲耘的死讯。她在广播中丧尽天良地咆哮：“死了就死了！”的声音给女附中师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现在，刘进和宋彬彬将这个“死了就死了！”的版权送给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德同志。为了减弱这句话的非人性度，刘进和宋彬彬对吴德的口气进行了文学的修饰。

刘进说：“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死了就死了。”；
宋彬彬说：“吴德听了汇报后半天都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的。……人死了就死了”。

显然，经过上述口径统一的修饰后，“死了就死了”这句话似乎好像真的变得有那么点儿人情味儿了。

“死了就死了！”的发明权现已无法勘定，因为吴德已死，死无对证。红卫兵选择文革后46年后说话的好处也在于此，重要的证人都死光了，吴德死了，王任重也死了，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纵情胡说。

但是在文革年代，刘进的这句“死了就死了”到底应该如何解读呢？还是让我们用谢富治在红八月中的一段话为刘进的“死了就死了”做注脚吧。谢富治在红八月中举行的一次公安干部会议上说：“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

刘进的“死了就死了”的含义和谢富治的“打死了就算了”的含义是对等的，且无需任何文学修饰即可读懂的。

刘进除了咆哮：“死了就死了！”在广播里还讲了些什么？

张静芬老师在卞仲耘遇害后的第五天给王晶垚先生写匿名信，控诉红卫兵的暴行，并提及刘进的讲话，张老师写道：“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某些人是噤若寒蝉，某些人是敢怒不敢言。6日上午广播，要封锁消息，这是封锁得了吗？”

上文提到的陶洛诵同学在《生之舞》中回忆当年刘进的讲话：“校长卞仲耘当晚死去。红卫兵头目第二天在学校的大喇叭里恐吓：‘任何人不许往外说，谁说出去谁负责。’”

上文提到的伏生同学的文章《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中这样回忆刘进的讲话：“教室里的有线喇叭响了，是革委会的刘进的声音。她说，卞仲耘被斗后，由于天很热，加上她平时就有心脏病，因此，她心脏病发作，死了。”

王友琴同学在她的《女性的野蛮》一文中回忆刘进的讲话：“……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席，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当然，她不说‘校长’，而是说的女校长的姓名，她说‘死了’，而不是说‘打死了’。”

在王晶垚先生保留的文革材料中对有一份《宋淮云、刘秀莹谈话记录》和一份《宋淮云谈话记录》。1967年4月23日师大女附中学生宋淮云在王晶垚先生面前回忆了1966年8月6日刘进的广播稿内容。王晶垚先生分别在两张纸上记录了宋淮云的回忆，宋淮云说：

刘进在广播中这样讲：“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得向外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宋淮云版的刘进广播稿字数不多，只有86个字。但是，这86个字中的信息量很大，重要的信息有四个：

第一、刘进承认发生武斗的目的“是为了杀（煞）卞仲耘的威风”。这个煞煞威风的主观动机在《宋彬彬谈话纪要》中宋彬彬也承认过。关于“煞煞威风”上文已作陈述，这里不再多讲。

第二、刘进说：“好人打坏人，活该”。文革中，最早在公众场合说这句话的是江青，时间是1966年7月28日，地点是北京展览馆。她的原话是：“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活该”。刘进只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

第三、刘进否认卞仲耘死于暴力，用死于心脏病、高血压为红卫兵开脱罪责。刘进的这个说法在《宋彬彬谈话纪要》中被宋彬彬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广播有个稿：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

第四、“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句话不可以理解为刘进在鼓励红卫兵继续打死老师。刘进是在鼓励红卫兵继续批斗校领导和老师。

如刘进宋彬彬坦言，卞仲耘死后的第一个夜晚对于她们确实是一个不眠之夜。她们先要在邮电医院面见死者的家属，宣告卞仲耘的死亡；又要赶到北京饭店去找吴德，寻找上级部门，探明态度；回到学校后又要商量明天如何向全校师生交代卞仲耘的死因。不知道是宋彬彬还是刘进出了一个主意——以心脏病和高血压来掩盖卞仲耘死于暴力的真相。从这个 idea 衍生出来

的具体措施就是第二次面见王晶垚先生时，提出要解剖卞仲耘的遗体——被王晶垚先生严辞拒绝。

慑于红卫兵暴力，邮电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不但错写了卞仲耘的年龄，还对卞仲耘的死因含糊其辞，写着：“死因不明”。但是，关于卞仲耘最终死因是“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说法，不翼而飞，流传甚广，其源头就是8月6日刘进的讲话。

据1966年11月27日王晶垚先生记录的《王永海谈话记录》，刘进在广播中也讲了打人不对的话：“第二天早上，学校革委会的广播里说：卞仲耘已经死了。这件事对学校的运动不利，这样做不对，大家不要到外面去说”。这段话与《宋淮云、刘秀莹谈话记录》中刘秀莹的谈话内容基本一致：“……卞死了，发生了这件事，对运动不利，大家不许传到外面去”。

刘进所谓打人不对的理由不是打人本身就是错误的，而是“对运动不利”。为什么打死卞仲耘对运动不利呢？在《宋彬彬谈话纪要》中，宋彬彬说得更清楚：“我们当时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不清楚，而且卞的线多，人死了对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

◇ 谢富治为什么要让宋彬彬为毛泽东献袖章？

下面，讨论一个延伸的话题：谢富治为什么要让宋彬彬为毛泽东献袖章？

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中学校长。北京市委和其它主管部门都曾派人到学校调查。作为主管治安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对8·5事件肯定一清二楚。但是，吴德、李雪峰和谢富治是否如实上报中共最高层毛泽东本人？现在看来值得怀疑。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死亡之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在举行。大约在8月6日左右，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向毛泽东通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及其夫人李敬仪夫妇8月3日被斗死的情况。江渭清的这个通报的直接结果就是在8月8日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上写明“要文斗，不要武斗”。《江渭清回忆录》中对此情节有详细的描述。

而吴德回忆录和李雪峰有关回忆文章中对师大女附中的8·5事件均无记载。其它文革资料也无卞仲耘之死被上报的记录。说明当年吴德、李雪峰和谢富治可能根本没有将卞仲耘的死亡报告上报毛泽东。因为，当年如果上报过卞仲耘死亡的情况，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在回忆录中书写的事情，如同江渭清及其自传。在文革中，向毛泽东隐瞒红卫兵暴力案件不是没有发生过，陈伯达就将解放军报记者反应红卫兵施暴情况的报告压了下来，理由是“太阴暗，不能送”。

《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形同虚设，对红卫兵根本没有约束力。如果李雪峰（北京市委）、谢富治（公安部）能够像江渭清一样，向毛泽东呈报北京市已经出现打死人的情况，或许会导致在《十六条》中出现比“要文斗、不要武斗”更加严厉的措辞，对即将出现的红八月杀人潮起到一些遏制作用。

从吴德回忆录中透露，毛泽东在红八月的23日抱怨北京乱的不厉害，太文明了。林彪为“乱”的程度定下了一个上限，即不要打死人。毛泽东和林彪的话表明，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8月17日北京第101中学陈葆昆老师被打死、8月19日外国语学校张辅仁张福臻老师被打死、8月22日女三中校长沙坪、八中校长华锦被打死等信息或许根本没有被报告到毛

泽东和林彪那里，所以毛认定北京太文明了，林认为“打死人”可以成为一个禁区。

王晶垚先生曾在听到《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时候产生一种极为善良的愿望，即因为有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卞仲耘虽然成为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也是最后一个被打死的人。用卞仲耘的死换更多人的生，或许是值得的。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王晶垚先生的愿望终成无望，红八月的死亡之门不可逆转的开启了。

宋彬彬承认，当年她为毛泽东敬献红卫兵袖章是经过谢富治的许可，而她本人也和谢富治认识。宋彬彬和谢富治到底熟悉到什么程度，宋彬彬没有详细说。宋彬彬为毛泽东敬献袖章的活动看似偶然，似乎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但是，作为一个政坛老客的谢富治，他真的不懂得让一个刚刚把自己学校校长活活打死的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无论是谁，为毛泽东敬献袖章意味着什么？只要那个沾有卞仲耘鲜血的袖章（王晶垚语）戴到了毛泽东的臂膀上，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就被合法化了。

八一八，天安门上，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这是一句略带“未来时态”的祈使句。其实，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早就动武了——“要武”是一个“现在完成时”的态势。

◇ 宋彬彬在文革中打没打人呢？

现在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宋彬彬在文革中打过人吗？

《宋彬彬谈话记要》以及其它材料都没有关于宋彬彬是或否打过卞仲耘的确切记录。

然而，讨论宋彬彬是否打过卞仲耘这个问题本身就非常无聊。就如同《记忆》曾经在男四中专刊中煞有介事地讨论该校在文革中确实没有本校师生被打死，而只有“小流氓”被打死一样无聊和无耻，似乎红卫兵打死那个“小流氓”就是天经地义的。

1979年春天，大规模平反文革中及建国后的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展开。当局高层为这项工作制定了一个“水落石不出”的总原则，即为受害者恢复名誉，但不追究害人者的政治和法律责任。在后来对“三种人”的排查中，基本维持了“水落石不出”的做法。实施上述原则的具体做法就是不允许司法介入和不圈定涉嫌人员，当然同时也就谈不上去排除涉嫌人员。

有了这个大前提，卞仲耘案件的模糊化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卞案水落石不出的情况下，单独澄清宋彬彬是否打过卞仲耘这一个情节是多么的可笑。

“水落石不出”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宋彬彬在文革中打过人，无论是在北京还是武汉，因为有了“水落石不出”的袒护，她就可以一生高枕无忧、平安无事；但是，如果她在文革中确实没有打人，因为有了“水落石不出”，她就一切都想说也说不清了，何况时光已经过去了46年。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局面是30多年前就已经预设好了的。否则还能叫“水落石不出”吗？

用叶维丽的话讲，关于宋彬彬与八五事件有关的说法，不自某女士始，而是流传了几十年，长盛不衰。还有人说，1966年10月在南方串联时，就看到一份到处张贴的传单，上面说宋要武打死了多少人，印象中有六七个人之多。而那时候袁腾飞还没有出生；徐友渔正远在成都指挥“红卫兵成都部队”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千家驹在做什么不得而知。追诉传说的源头只能达到一个结果，提醒人们关注宋彬彬。宋彬彬在文革中到底打没打过人？常人只能猜测！而对此问题是与否的猜定并不是取五五对开之势。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凡是经历过红八月的

人，他们的判断会更多的倾向于 Yes，或者 Maybe。这就是民众记忆和历史记忆的指向性，用恩格斯的话讲，它是一个矢量和，是具有方向性的，且不以权势的意志为转移。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发表后，网络上留下数以万计的指责性留言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王晶垚先生已经公布了他手中的材料。红卫兵会如何回应？红卫兵和王晶垚先生第四个回合的斗争即将开始。为了文革中的受难者，王晶垚先生不会退让；红卫兵更不会退让，因为她们不想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会以什么样的结局记入史册？

读者可以拭目以待。

（未完待续）

□ 原载《北京之春》2012年8月号

~~~~~

## 【读书笔记】

### 红卫兵运动的起源

• 尹敏志 •

1965年，当北岛迈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门时，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天堂。除了繁重的学业外，每天被骑进学校的高级进口自行车，飘荡在耳边的高层小道消息，以及每周末只有高干子弟有资格参加的会议，都让他感到莫名的自卑和压抑。而在同时，所有人的衣着却又都很统一和朴素，甚至朴素到了可疑的地步，显得很“平等”。这让北岛感觉很不对劲：“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直到文革的某天，北岛走进教室，忽然大吃一惊：高干同学们已经摇身一变，披上了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呢制的将校制服，脚踏大皮靴，腰扎宽皮带，手臂上的红卫兵袖标红得耀眼。红色贵族们的这身华服，瞬间将自己与其他同学截然区分开来。这时北岛才恍然大悟，之前自己的压抑，原来就是来自这种隐而未发的优越感——终于，它“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貌。”

《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是18位亲历了文革的四中学生的回忆录。由于书中大部分作者都属于寒门子弟，所以文革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他们的共同记忆。比如在王祖镔看来，当时阶级路线被贯彻得越来越严格，无论是上学、参军还是工作，都要看出身，家庭背景不好的人处处受限，根红苗正的人则享有很多便利，“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有些人还是不满意。”赵京兴则说得更大胆直白：“按照教科书和老师的讲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美好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事实并非如此。”

用不平等、压迫等常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词来描述社会主义社会，这乍看起来很令人惊讶。但正如卡尔·波普（Karl Popper）所说，即使在共产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后，马克思预言的“无阶级的社会”也不会出现，因为就在推翻旧政权的那一刻，“手握权力的人很快便会组成一个新的贵族或官僚阶级，并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新统治者。”他们会极力掩饰这一点，而最好方式莫过于保留并利用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充分利用它，“一方面，使这些新统治者的权力合法化，并不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精神鸦片’来麻痹无知的民众。”

高干子弟和寒门子弟之间的利益冲突，才是产生全国性红卫兵运动的社会基础，文革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建国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只打击了旧社会的统治阶级，红色贵族的权力则乘机无限膨胀。统治者虽然换了，但统治结构却没改变——就像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后出现的情况。不知不觉间，人民内部已经形成了四个阶级。四中学生就是当时社会结构的缩影：高干子弟的地位最高，工农兵和普通干部子弟次之，知识分子的后代再次。“黑五类”子女则早已沦为贱民，绝对进不了四中。

文革开始后，高干、工农兵、知识分子二代都组成了各自的红卫兵组织，分别称为“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虽然这三派红卫兵都使用相同的革命话语，一眼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区别，但只要从他们的具体行为和立场来分析，就能看出这三派红卫兵其实有着各自明确且迥异的政治诉求。

“老兵派”又被称为“第一代红卫兵”，顾名思义，他们是率先投入文革浪潮的。由于能通过家庭在第一时间了解高层政治动向，他们可以先发制人。文革初期是“老兵派”的天下，他们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著名口号，并由刘辉宣谱写成《红卫兵战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随后的3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围绕着“血统论”和“出身论”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当时所有社会资源都已经向红色贵族们倾斜，但他们还是不满意，担心“狗崽子们要翻天”。所以，他们要利用文革，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对于这个意图，“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寒门子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们暂时敢怒而不敢言。

“老兵派”的行动紧锣密鼓。6月初得到毛泽东有意废除高考的内部消息后，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的十几位高干子弟立即起草了“废除现行高考制度”倡议书。此倡议书由刘源提交给时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并随即见报。这份倡议书称，高考制度“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来的教育方针。”但其实“老兵派”更隐秘的动机是借由废除高考，彻底堵塞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建立某种“社会主义门阀制”，让红色贵族们世代掌权。

但是，风光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在8月5号忽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和整个官僚阶层，并随后解散工作组，却使得“老兵派”的形势急转直下。我们至今无法确定，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究竟是缘于对官僚阶层的不满，还是为了打击政治异己，攫取更多个人权力，或者仅仅是出于一种革命理想主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此举为之前被压抑很久的“四三派”、“四四派”，即“第二代红卫兵”的横空出世扫清了障碍。尤其是8月18日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后，“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更是强烈地感觉到，毛主席是支持他们的。他们因此陷入领袖崇拜的迷醉中无法自拔，并在随后肆意“倾泻我们无情的暴力”，直至掀翻天地。

“四三派”和“四四派”（寒门子弟）的政治诉求与“老兵派”（高干子弟）针锋相对。前者要求的是“打碎特权阶层”，剥夺红色贵族的权力，“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遇罗克的《出身论》是“第二代红卫兵”的政治纲领。在他们看来，刘少奇是支持“血统论”的，代表官僚阶级的利益；而毛泽东则是支持“出身论”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他们强烈要求打倒刘少奇。作为精神领袖，遇罗克始终对毛泽东抱着很复杂的感情。但是在“血统论”横行太久的情况下，除了支持毛外，实在是没有其他选择。在遭逮捕并被处决前，遇罗克还将一封长信交给牟志京保管，“在今后情势允许时，交给毛泽东”。

总体来说，在所有的红卫兵派别中，“老兵派”是相对来说是最“理智”，破坏性也是最小的。暴力毕竟只是他们用来显示自己“革命性”的手段而已，对于这个迟早会从父辈那里继承过来的江山，何必要将其打得千疮百孔呢？“老兵派”希望的是文革不要持续太久，达到目的

即可，见好就收。但“四三派”“四四派”中的很多人则纯粹是为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而投身文革，是为暴力而暴力。在著名“红八月”里，他们走上街头集体狂欢，一时血雨腥风。本着“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四三派”、“四四派”由一开始反对“老兵派”，反对官僚阶级，进而发展到反对社会的一切秩序，无论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这种破坏一切社会秩序的狂热被黑格尔（G. W. F. Hegel）称为“否定的意志”，这种意志“只有在破坏某种东西的时候，才感觉到它自己的存在”。通过无止境的破坏，他们暂时获得了一种空虚的自由。“这种意志以为自己是希求某种肯定的状态，例如普遍的平等，但是事实上它并不希望这种状态成为肯定的现实，因为这种现实会马上带来某种秩序。”他们担心一旦文革结束，旧有的金字塔形等级制便会死灰复燃。他们渴望的其实是真正的社会平等，但“这观念实现的只能是破坏性的怒涛”。

单从力量对比上看，寒门子弟人数远远胜过高干子弟，所以前者能在短时间内扭转局势。但权力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奥尔森（Mancur Olson）就曾指出：“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文革初期的“老兵派”由于人数少，容易统一行动，所以局势始终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但“四四派”、“四三派”则由于人数众多，在短暂的一致对外后，便无法统一行动，反而分裂为很多小派别，为争权夺利而开始倒戈相向，武斗浪潮随之席卷全国。

发展到最后，红卫兵运动渐渐脱离了追求平等的初衷，只剩下野蛮的权力斗争。有的人始终一往无前，最终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肉体湮灭。有的则被现实的血腥和残酷所深深震撼，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并痛苦地思索这场运动的意义。毛泽东也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于是便提倡上山下乡，把红卫兵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借此稀释其破坏力。于是1968年，一批批的红卫兵带着困惑和失落，经火车站离开一片狼藉的北京城。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远方荒凉且贫瘠的农村将成为他们的炼狱。

在“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看来，文革中的他们是“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若非他们挺身而出，中国早就建立起严密的金字塔形等级制了。而在“老兵派”看来，他们在文革中始终代表着一股稳定的理性的力量。他们在“红八月”局势失控时组织“西纠”，通过一系列行动试图阻止流血事件的蔓延。随后更是成立了“联动”，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甚至还要“打倒江青”，并“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这难道不是有反文革的正面含义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方都能从自己的角度来为自己辩护，这是文革以后，很少会有红卫兵进行主动反思的根本原因。

而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红卫兵（知青）所受的种种磨难和不公待遇，则使他们转而认为自己才是文革中真正的受侮辱与损害的人，由于这苦难，之前犯下的罪恶似乎都可以一笔勾销，“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也在不知不觉间被完全颠倒过来——这是永恒的规律：比起加害行为来，人类更容易记住的是受害体验。

也许文革的唯一贡献，就是让大部分人看清楚：国家社会主义不但不会带来物质财富，甚至连其最引以为傲的“人人平等”，也不过是张空头支票。变革与开放的力量正是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开始抬头。但有些问题似乎永远难以解决：1968年“四三派”和“四四派”斗得血肉横飞时，一个已失势的“老兵派”同学依然无比高傲。他极为自信地跟北岛打赌“二十年后见高低”，并称“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 原载《经济观察网》2012-08-04

~~~~~

【往事非烟】

永忆1976年

• 王 蒙 •

老百姓说：“今年是天崩地裂。吉林的陨石雨、云南与唐山的地震，都不是偶然的。今年（上天）收贵人。”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知识结构相当新的人也认为，这就是天人合一，天灾就是缘于人祸，这是“文革”造成的。这样说并没有科学根据。巧合也罢，整个1976年的事态太惊人了。本文摘自《中国天机》部分章节（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王蒙）。

“文革”当中，毛泽东还有一段有名的语录：“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1969年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上述理论性指导意见，标题是《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一时间全国男女老少，都在那里背诵“动脉、静脉、心脏、血液、肺部、二氧化碳、氧气……”似乎是在普及生理卫生学常识。有些人一边念此段语录，一边忍不住笑，觉得它实在是别开生面。

我至今不明白这样一个针对执政党的组织建设的指示为什么要全民学习贯彻。可以解释的是，这是中国特有的民主与集中，人民当然关注执政党、领导党，而党也必须接受人民的关注，最好是监督。

“文革”后期，还传出惊人的毛泽东语录：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你说，老人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对“文革”前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不称心、不如意？

从这些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65年，毛主席已经忧虑，最后的结果是新社会与旧社会差不多。为避免这种他认为很难避免的前景，他不惜一切代价，不惜单枪匹马，要做成一个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社会模式，即“五七指示”式的模式。可惜的是：

一、这个模式太含糊。

二、人类几千年的生存，形成的一些社会体制形式，当然不是可以说断就一刀两断的。喊决裂易，真决裂难，真决裂也未必能带来好结果，真决裂如果客观上变成做不到的空口号、假口号，更糟。认为数千年前的人类社会都是毒蛇猛兽们缔造的，恐怕是幻觉。

三、平等、平均、一致、一体、无差别、无不平，有它的可贵可爱之处也有它的空洞与乏味之处。人间的生活模式无法消除人与人的一切差异，包括贫富、强弱、寿夭、智愚、勤懒、城乡、官民、肤色、东西方、男女、健康与病残……社会应该做的是既鼓励强者勤者，又保护弱者，避免差异的恶性扩大。你不可能抹掉一切差异。

四、毛泽东的预见有他合理的一面，他有意采取的孤军加群众人海的奋斗的方法，却是难以操作与实现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五、为了避免走回头路，毛泽东不惜对中国共产党动吐故纳新的大手术。这从哲学上讲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却只能乱党乱国。完全不吐故纳新又是不可取的，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六、不止这一次的“动脉静脉肺”说，历次政治运动，到了后期，到了党员重新登记、重新恢复组织生活、干部重新分配时期，往往不是吐故纳新，而是不得不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尤其是“文革”，又是瘫痪党委，又是五七干校，又是斗批散斗批走（指搞完斗批就解散走人），最后呢？还不是回到原点去了。这是为什么呢？现实比人强，形势比人强。人的意志再伟大，改变不了客观的真实现状。

七、“文革”“文革”，“文革小组”里聚拢的是一批嘴尖皮厚的笔杆子，搞到后来毛主席最后竟然起用的是江青、毛远新、王海容等亲属，毛主席要支持的竟然是交白卷的张铁生，摆出一副接班人架势的竟然是空手套白狼的王洪文……呜呼哀哉！

在毛泽东的词中，人们对于《念奴娇·昆仑》的理解是最差的。然而，我越来越觉得，此词最符合毛泽东的性格与悲哀：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就是“莽昆仑”，“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搅得周天寒彻”，“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有一个说法，说是毛主席本来计划“文革”要搞上三年左右。没有正式的依据，但我觉得此说靠谱。因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重大的政治运动、政治举措，所用时间可没有像“文革”这样长的。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苏区时期有反围剿十年外，抗日战争也才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和平时期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是一个冬天，“反右”是一年左右，其他“肃反”“镇反”用的时间都有限。按当时的工作节奏与主席的只争朝夕精神，实在难以设想1966年开始“文革”时，主席已经安排到了十年左右的计划。原因是各种情况各种问题的涌现，超出了主席的想象。所谓的保守派的力量比主席预料的要强大，造反派的状况相当不争气，党政军各方面尤其是老师们与国务院的领导们的阻力超出想象。两派全面内战，没有预料到。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尤其是林彪事件，给主席以重大打击。

“文革”中主席用尽了各种政治谋略。先是依靠红卫兵娃娃，背后则是依靠部队轻易地打倒了刘、邓、陶。再是依靠军宣队搞了夺权与三（一军、一红卫兵即群众组织代表与一亮了相就表明拥护“文革”的领导干部）结合。此时两派恶斗不已。又是靠工宣队。靠极“左”的投机笔杆子们，靠“四人帮”靠上海等。还曾想起用邓小平稍作整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主席的晚年似乎有些悲观，在我国自己拍摄的故事片《毛泽东的故事》中，表现了老人家晚年接见尼克松的女儿与女婿的场面。毛强调自己快见马克思去了。尼的孩子则说，是您改变了世界，不必急于去见马克思。主席一听，有点苦笑，说，我哪里改变了世界，顶多改变了北京的几个郊区。这与“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时的调子大大不同了。

如此这般，到了“文革”第十年即1976年，到处仍然是一片混乱。

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万民同悲，人心郁闷。周恩来变成了忠实与鞠躬尽瘁、秩序与合情合理的符号，变成了抵制装腔作势、大轰大嗡、成事不足、乱世有余的“文革”人物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等的中流砥柱。客观上，周恩来变成了至高无上、惊世骇俗、扭转乾坤的毛泽东的最主要的参照系统：他忍辱负重、平衡稳健、苦口婆心，光劝和整天打烂仗的各派红卫兵，他用了多少时间、多少精神？他活得太难了，工作得太难了。毛泽东太伟大了，老百姓够不着，而周恩来大家都看得明白，感同身受，视若亲人。

这样的良相的角色，没有他，毛泽东很难工作，在毛泽东的天才型的富有想象力的指挥之下，没有周的填空补缺、避险化难，一个“文革”早就乱了套了，党与国家早就崩溃了。他的存在与他的形象，客观上反衬了毛泽东的某些说法做法的不着边际。时间长了，他不可能不受

到某种不那么满意直至猜忌的压力。

周恩来的去世毁坏了某种不平衡下的平衡，中国更加不稳定了。

2月，开始公开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传言四起，腹诽如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的感觉是，老人家放弃了最后一次自我调整的机会，失落了避免百年之后出现大的变局、危局的可能。我们国人，失去了最后一次平稳地实现国泰民安、安居乐业、走向富足的生活的希望。批邓批邓，“文革”已经十年，乱局已经飘摇，干事的不如偷懒的，效力的不如忽悠的，意欲建设的尤其不如捣乱破坏的。谁看不出来？能不天怒人怨、丧尽人心乎？

3月8日下午，吉林发生陨石雨。陨石在离地面差不多20公里的空中爆炸，3000多块碎石洒落一地，最大的陨石重1770公斤。人民愕然、怵然，不知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

4月5日，天安门前，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遭到了暴力驱逐镇压。终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而且“四人帮”掌握的媒体立即愚蠢昏聩地命名邓小平为邓纳吉，指邓小平搞起了类似匈牙利事件的事情，这就更加凶险，其暗示更加不祥了。

5月28日，云南两次发生地震，丧生者98人。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伤24万人。“四人帮”的政策是不接受任何外国的救灾援助。这与后来的汶川大地震形成鲜明对比。即使外援的作用有限，至少还有象征的意义，不能把中国搞得那样惨兮兮孤零零的呀。

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世震惊，国内各种矛盾尖锐化。中国面临着再一次的重大选择。

10月，“四人帮”被“粉碎”掉了，号称是第二次解放。

我年初就估摸过：春节过后会出事。我知道，春节拜年，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交流信息与意见的机会，而当时的民心，对于“文革”已经是全面地否定了。

果然，春节期间，我知道的城市干部与知识分子当中，关于“文革”上来的那四个人贬低周恩来，关于美国记者出版了描写江青的《红都女皇》，关于邓小平的得民心的整顿生产秩序的措施又受到“文革”人士的阻挠，以致关于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受到打击、身体日差的说法都是不脛而走。极“左”了半天，红海洋了半天，老百姓的思想反而更“解放”了，议论到了最上面，掂量到了最上面，臧否到了最上面。民心未可欺也，这是“文革”人士们所始料未及的吧。回想1974年林彪事件后，短短的一段时间大家都骂林彪的极“左”，马上上面定调子，说林彪是“右”得不能再“右”了，而且非常勉强地把批林转到批孔子批周公身上。根据是说林彪有一幅字“克己复礼”。

经过长期的培育，言传身教，百姓们也渐渐学会了吃菜吃心，锣鼓听音儿。一批判大儒，哪怕是新疆这种相对边远的地方，就是我的一些最不关心政治的老学究同事，也嗅到了批周恩来的味道。“大儒”的帽子给周恩来一戴，反而为总理增加了一个耀眼的光环。我的一位学究老友，深深感叹赞美道，周就是大儒，是真正的大儒呀！

此后传出不少毛主席批评儒家、骂孔子孔老二、赞美秦始皇的话语来。我的体会是，真的，毛主席不喜欢，也可以说是厌烦孔子的仁义道德尤其是仁政王道的这一套。毛主席信的是权力哲学。列宁说，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到了中国人民这里，毛泽东时代强调的是“权，权，权，命相连”，“文革”中甚至将“忆苦思甜”的说法改变为忆苦思“权”。毛泽东强调的是

阶级斗争的暴力化——武装斗争，是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依靠人民群众，是（告诉反动派）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线，整合、扬弃与汲取了权威主义、实力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尤其是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年月，依毛主席的说法，搞什么宋襄公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搞什么温良恭俭让，搞什么仁政王道，那就是扼杀革命，就是为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设立防护网，就是让地主老财永远地压在人民群众的头上，就是不敢胜利，自取灭亡。

毛主席与周总理同在1976年去世，但两个人的过世给人们的感觉颇有不同。周总理的去世人们感到的是沉痛、沉重、悲哀。周在这个时候走了，乱成一团的国家更不知道要走向何方。人们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的衰老与老而益坚、老而益奇、老而益倔强，已经难以理解他老人家了。毛主席在晚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法权，令人在五体投地的同时倒吸一口冷气。如此这般，整个人类社会得从头设计，得回到猴子变人的原点，敢情从周口店猿人时期咱们的人类社会就走向了歧路。这看法高明得令人怎样弹跳摸高也够不着。电视上最后一次的主席出镜似乎是与巴基斯坦军人执政者叶海亚汗的会见，主席举步维艰，头往下耷拉，嘴巴也闭不太严。还传出来小道消息，说是叶海亚汗捎来了口信，是什么国际组织关心当年的著名大学生“右派”林希翎的处境。林从而被恢复了自由云云。

主席的去世令人惊惧，正如将本年的天崩地裂再应验一遭，落到了实处险处。我多次叹息，多次忧心，好也罢，赖也罢，爱也罢，怨也罢，伟大也罢，奇崛也罢，胜利接续着胜利也罢，挫折硬不承认是挫折乃至闹出了新挫折也罢……毛泽东与我们共同摸爬滚打了小30年，他的笑容，他的与众不同的思路与说法，他的雷霆万钧，他的好斗，他挑起的或者是被挑起的以阶级斗争为旗帜的国内外诸种纠葛冲突，他的顽强与他的虚虚实实，乃至他的书法、他的诗词、他的文体都已经是我们的、你我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你我他的命运、说话、用词、悲喜都与他老人家分不开。如今他老了，他走了，他没了，你我他也就跟着落进了宇宙大黑洞里头啦。

1976年9月8日，星期三，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丙辰年丁酉月癸亥日。明晃晃的月光，照得时在乌鲁木齐十四中学家属院的我们睡不着。我与妻一起议论老人家的健康状况，唉声叹气，我们说批邓使国家陷入新的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再一次掐灭了老百姓的希望。老人家一旦仙去，国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会遭遇哪些危险，边疆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中国没有了毛泽东，天啊，天要塌下来的啊。

我永远忘不了1976年中秋节乌鲁木齐的那一夜月光。此后的许多中秋节，都碰到了浮云遮月的情况。乌鲁木齐的晴朗干燥的天气，与当时做不起遮光性能良好的窗帘，使得明晃晃的月光令人心乱，难以入眠。

谁知就在次日，1976年9月9日下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日子，通知新疆自治区文联全体职工到自治区文化局创作研究室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我已经猜到个八九不离十，我提醒自己，各级各界人士必须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听广播，明白了。毛主席就是在明晃晃的中秋月光中告别了他的中国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主席刚一辞世，一切该发生的事态立马就发生了。说是翻天覆地，又像手到擒来；说是千难万险，又像不战而胜；说是惊心动魄，又像顺手牵羊。敢情“四人帮”早已人心丧尽，“文革”早已臭名远扬，极“左”早已被认定是穷凶极恶、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早已被看出了装腔作势、破绽百出；周恩来、邓小平代表的健康正常的力量早已被人民所期待。整个中国像一个已经熟透了的苹果，一碰就掉到了百

姓手中。整个“四人帮”，就像几只烂透了的虫子，气一吹就化成了齏粉。历史解决那些已经成熟了的任务，竟然是这样天公地道，顺风顺水，自然而然，一通百通。而所谓“文革”派，竟是那样的不堪一击。伟大的毛泽东的在天之灵有知，能不惊呼一声“原来如此”吗？

我越来越坚信，毛泽东太伟大、太有特点、太不常规了。没有他中国也会有革命，但中国的革命未必胜利，如果是王明式的人物领导中国革命的话。尤其是，没有毛泽东就绝对不会有中国的革命胜利17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了毛泽东、他的妻子江青、几个迎合老人家的“秀才”、一批政治投机红卫兵“领袖”与一些乳臭未干而又心比天高的红卫兵原教旨主义者以外，到了1976年，他们的“文革”可以说是丧尽了人心，失尽了民意，输光了本钱，为自身挖就了坟墓！

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可怜可爱的伟大祖国！

□ 原载《文汇报》2012-7-6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